

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

宋月萍 马 腾

〔摘要〕 同乡会因差序格局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自发聚集而形成,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同乡会不但维系着来自于同一地域农民工的情感凝聚,甚至会促进他们劳动收入的增加。目前针对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参加同乡会对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正确引导同乡会的发展,让同乡会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将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 同乡会;劳动收入;社会资本;倾向得分匹配

〔作者简介〕 宋月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量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形成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离土离乡,既转变了就业方式,也脱离了原来生活的乡土社会。而同乡会以地缘为纽带,是移民在异地相互联系、交流和互助的组织。对农民工而言,同乡会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极具特色的社会资本,其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值得进行研究。

同乡会植根于同乡文化,是“同省旅居者的正式结社”,其目的在于“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1]而作为在情感上为异乡人“联络乡谊”^[2]的组织,同乡会不仅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化平台,改变农民工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3][4]},而且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社会资本,它也能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就业和收入的增加^[5]。

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讨论同乡会的合法性,并且多从历史学、社会管理等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少有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论证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同乡会的经济功能。而从社会资本角度理解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能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深化我们对

同乡会功用的认识,而且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本土化实践。

一、社会资本视野下的同乡会与农民工劳动收入——文献综述

同乡会原来是指少数民族聚集的一种形式,在人口流动的情境中,它既是差序格局下移民在城市中的聚集,又是同一流出地人口基于地缘关系组成的正式组织,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同乡会的基础是个人的同乡关系网络,具有组织化特征。有研究指出,同乡会的身份资格来自差序格局中的一环,并且以相同身份——大家都从属于同一地缘,都有资格加入同乡组织——获得成员资格,而且在加入同乡组织之前大家一般彼此之间并无交往历史。^[6]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农民工的同乡会——既存在正式组织结构以保证同乡会的运行,又存在非正式的乡土情结作为连接纽带。

已有文献不乏对同乡会的起源、功能以及合法性进行的探讨。以少数民族裔聚集研究为代表的理论分析构成了同乡会研究的理论基础。同乡会

的形成基于移民的聚集，这种聚集往往是具有自我保护性质的。少数族裔以族群聚集的方式组织起来，能在同种族的经济体中获得相对公平的经济机会^[7]，尤其是在就业、生存资源的提供上，移民的聚集能够实现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共赢^[8]。而对同乡会存在的合法性的讨论则根源于同乡会组织的特殊性。有研究从宪法学的角度对同乡会组织予以法律意义上的承认，认为同乡会作为一种兼具亲密性与表达性的社团，已经落入了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应受宪法保护。^[9]但也有研究认为，同乡会介于“合法民间组织”和“非法民间组织”之间^[10]，甚至有犯罪化的可能，当与雇主发生矛盾时，往往采取“过激”的行为，容易产生社会治安案件^[11]，同乡会的合法性也因此而受到质疑。

对农民工而言，“离土又离乡”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培育社会网络对其就业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些分析发现，农民工的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于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12]从这个角度来说，同乡会聚集大量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同乡资源，将是农民工尤其是初来乍到的农民工在城市获取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从而对其劳动收入带来正面影响。

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在多数情况下，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能促进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13]，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存在差别。王春超在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作用时，将社会资本区分成强调农民工与当地员工之间关系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和因地缘或亲缘而形成的“整合型”社会资本两大类，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建立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如工会、认识的当地居民数量等）对农民工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整合型”社会资本，如同乡关系，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则不如“跨越型”社会资本。^[14]该研究使用了“来自北方或南方”的指标设置来衡量地缘因素，并不能直接度量同乡关系，更不能涵盖同乡会的概念。而另一些研究肯定了就业场所中的同乡聚集对农民工的经济

促进作用，即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收益^[15]，但就业场所的同乡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特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乡会。同乡会作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整合型”社会资本，它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还并不明晰。

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其中既包括基本的家庭关系、亲属关系这样的“强关系网络”，也包括老乡关系这类“弱关系网络”。宗成峰考察了弱关系（通过朋友、熟人、老乡等关系来获得工作）和参与工作组织情况（业余参与到同乡会、工会工作联盟等），而这些因素并未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影响，但由于其所研究的样本仅限于建筑工人，同质性较高，不能全方位描述农民工社会资本对收入影响的整体样貌。^[16]何国俊等以婚姻状况、找工作途径（亲戚、老乡）和在京其他家人数作为社会资本变量，考察这一变量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对所选取的样本而言并不显著，但却发现通过老乡找工作的女性对其收入的提高造成了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社会网络的“自我复制”和女性更偏好稳定而安全的工作。^[17]刘林平、张春泥的研究以参加工会、请客送礼费用和是否使用社会网络增加工资等变量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发现影响并不显著。^[18]黄利、周密以“拜年网”中亲戚和朋友数量代表社会资本，同样发现影响并不显著。^[19]章元、陆铭则运用赠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及礼金占家庭总支出比等变量指标来衡量社会网络，发现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进而指出社会网络对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作用并不明显，它在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是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来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20]

当前的研究并未就对农民工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类组织型社会资本——同乡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论证，针对同乡会和农民工劳动收入之间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部分研究即使纳入了同乡资本，也仅仅是度量农民工个人在流入地零散的同乡关系的影响，并没有分析同乡会这种组织化社会资本的影响。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得出

的社会资本对劳动收入影响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同乡会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还不明晰。根据前人的研究,本研究将采用最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以进一步明晰同乡会这一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组织形式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对农民工就业、收入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启示。

二、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

(一) 数据选取

本文使用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该调查的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16~59 周岁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该调查在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泉州市各抽取 2 000 名流动人口,1 000 名当地户籍人口;在陕西省咸阳市抽取 1 000 名流动人口,600 名当地户籍人口。我们将非农业户口性质的样本以及收入、月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数为空值的样本剔除,最终得到 13 006 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

(二) 实证分析模型

我们首先建立农民工劳动收入决定方程,以考察参加同乡会与否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

$$\ln Y = \alpha + \beta T + \gamma X + \varepsilon$$

方程中, $\ln Y$ 为农民工每小时劳动收入的对数形式, α 为截距项, β 、 γ 分别为加入同乡会情况 T 、其他控制变量 X 的回归系数(或系数向量), ε 为误差项。此处之所以用“劳动收入”而非“工资”,是因为农民工就业身份呈分化状态,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从事自我雇佣的工作,甚至一部分农民工已经是雇主身份,此处用劳动收入度量更为合适。关键解释变量为是否加入同乡会,为虚拟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培训情况(是否在近三年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在本地工作年限以及地区(城市)变量等。

(三) 内生偏误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在考察农民工参与同乡会对其劳动收入的影响

时,简单估计会存在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带来估计的内生偏误。从社会资本积累的角度理解,参与同乡会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民工个人对劳动收入期望的影响,那些渴望找到高收入工作的农民工将倾向于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但一个人对劳动收入的偏好往往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因此我们无法通过调查数据直接控制农民工个人的偏好。如果在度量同乡会参与情况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时忽视了这种偏好,就将会错误地估计参与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作用,错误的程度就是内生性偏误。在横截面数据中,通常通过寻找工具变量或者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控制这种内生偏误,本研究将采取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是一种基于观测数据(observational data)来分析变量间因果关系并且能够有效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数据处理方法。在本文中,倾向得分可以理解为在给定一系列可能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参与同乡会的条件概率。

本文想要探究的是参与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最理想的办法是获得每一位农民工在没有参加同乡会以及参加了同乡会时的劳动收入,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同乡会的收入效应。然而,现实中只能观测到每个农民工在没有参加同乡会或参加同乡会后的其中一个劳动收入,简单地用参加同乡会的人和没参加同乡会的人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同乡会的收入效应,有可能带来误差。这是因为两类群体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经历等诸多因素上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差异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同乡会的选择。只有在控制了选择差异后,样本中存在的选择偏误才有望被控制住。倾向得分匹配将这些因素转化为接受干预(treatment)的条件概率^①,依据这个倾向得分,该方法在整体样本中为每一个参加同乡会的样本匹配一个与之相似^②的未参加同乡会的样本作为对照,这就使本文通过测量二者之间的收入差异来估计农民工参

① 本文中,它表示一位农民工选择参加同乡会的条件概率。

② 这里的相似是指二者拥有大致相同的可能性去参与同乡会,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随机假设。

加同乡会的劳动收入效应成为可能。通过回归得到每一个农民工参加同乡会的倾向得分，这样可以将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和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在解释变量上的差异通过一个倾向得分展现出来，然后将每一名参与同乡会和与其倾向得分最接近的那些没参与同乡会的农民工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样本中存在的内生偏误。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农民工参加同乡会的情况及相关特征

在我们选取的样本中，男性占 56.94%，女性占 43.06%，平均年龄为 32.50 岁，平均月劳动收入为 3 357.67 元，小时劳动收入为 14.76 元。有 1 098 名农民工加入了同乡会，占 8.44%。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劳动收入要高于未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平均小时劳动收入为 15.60 元，而未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为 14.69 元。

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2.3 岁，78.9% 的人已婚，68.4% 的人学历在初中及以下。同乡会成员在最近三年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的占 22.4%，比未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高出 10%。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为雇员的比例 (68.8%) 要高于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而自我雇佣的比例 (24.4%) 要低于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在企业务工的人员更可能因同乡聚集而参加同乡会 (出于简洁的目的，描述结果并未在此显示)。

(二) 同乡会参与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的统计检验

双变量统计结果 (表 1 模型 1) 显示，相比于未加入同乡会，农民工加入同乡会后，其小时劳动收入会得到 4.9% 的提升。而控制人口学变量 (诸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后发现 (模型 2)，加入同乡会相比于未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的小时劳动收入仍旧会提高 4.3%，可见，同乡会对于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的作用是比较稳定的。除此之外，模型还发现，男性小时劳动收入比女性高 22.8%，说明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性别差异明显。另外，相比于未婚人群，已婚者小时劳动收入高出 12.9%，有过婚姻经历的人收入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带来的双方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整合会导致经济收入的上升。教育的影响则更加明显，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人相比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小时劳动收入会提高 12.4%，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相比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收入会提升 35.8%，可见教育对于农民工收入提升的重要性。

当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就业身份、培训经历和在当地连续工作年数等因素后 (模型 3)，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作用依然显著，为 4.8%。其中，近三年内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职业培训的人比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的小时劳动收入高出 3.6%。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时间越长，小时劳动收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

表 1 农民工小时劳动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是否加入同乡会	0.049***	0.043***	0.048***
年龄		0.037***	0.036***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1***
性别 (0=女)		0.228***	0.232***
婚姻状况 (0=未婚)			
已婚		0.129***	0.091***
其他		0.077*	0.079*
受教育程度 0=(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0.124***	0.130***
大专及以上		0.358***	0.360***
培训情况			0.036***

续前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在本地连续工作年数			0.012***
在本地连续工作年数的平方			-0.000***
雇佣状况 (0=雇员)			
雇主			0.225***
自雇			0.011
城市固定效应			Yes
截距	2.538***	1.702***	1.824***
样本数量	13 006	13 006	13 006
调整后 R ²	0.001	0.104	0.151

注：***表示1%程度上显著，**表示5%程度上显著，*表示10%程度上显著。

如前所述，在对农民工参加同乡会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时，由于遗漏变量问题的存在会使模型估计产生偏误。为进一步论证参加同乡会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文章以没有加入同乡会的农民工为控制组 (control group)、以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为干预组 (treated group)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在选择匹配方法时，多种方法各有所长。为能验证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多种匹配方法，包括一对一近邻匹配、一对五近邻匹配、半径匹配、高斯内核匹配等方法^[21]，以相互验证干预效应，即参加同乡会对农民工劳

动收入水平的作用。

通过将参加同乡会与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进行匹配，可得到控制内生偏误后的同乡会的收入效应。在分析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之前，应先对匹配质量进行评估。将工资决定方程中所用到的控制变量全部纳入倾向得分估计，并比较匹配前及匹配后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图。比较后发现，在匹配之前，二者选择同乡会的倾向得分的概率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在匹配之后，两者选择自我雇佣的倾向得分的概率分布已经非常接近。这表明，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和未参加同乡会的农民工各方面的特征已经非常接近，匹配效果较好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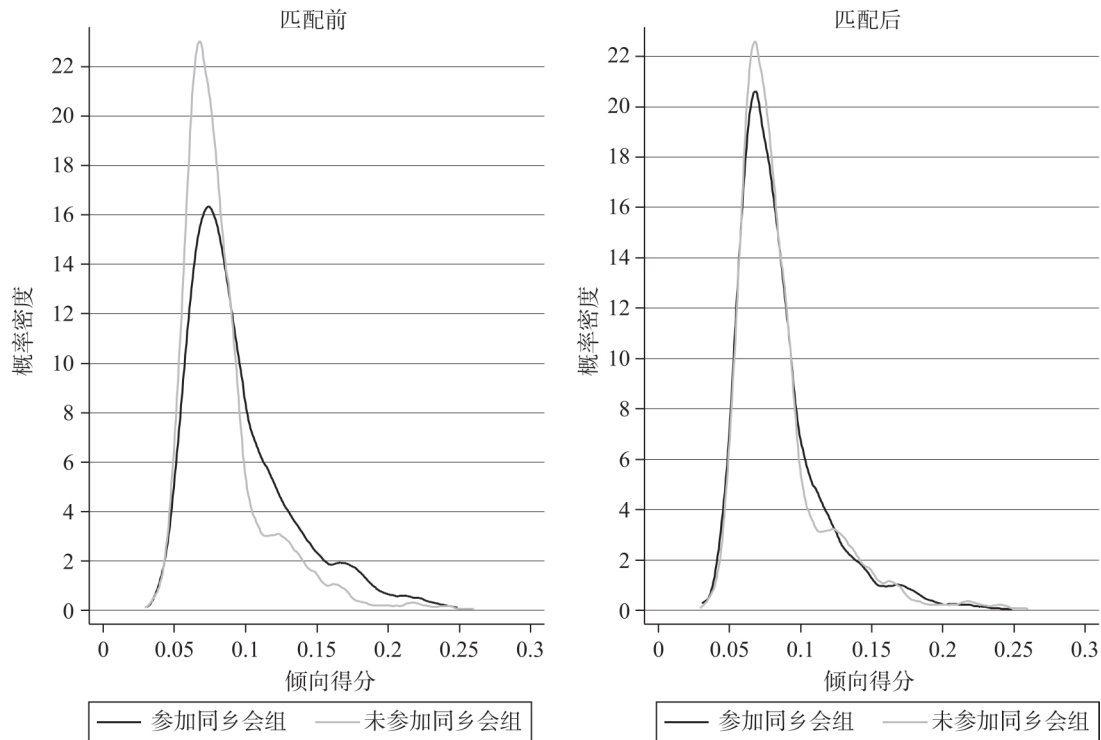


图 1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参加同乡会的概率密度分布图比较

在采取不同倾向得分匹配后,可发现农民工参加同乡会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大概在 4.3%~5%之间(见表 2),而且 4 种匹配方法得到的结

果均非常显著,这充分说明,即使控制了加入同乡会的倾向异质性,同乡会对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仍然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2 不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下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方式	效应	Bootstrap 标准误	T 值
半径匹配	0.0502	0.0130	2.98***
一对五近邻匹配	0.0460	0.0225	2.49**
高斯内核匹配	0.0471	0.0264	1.98**
一对一近邻匹配	0.0436	0.0308	1.85*

注:***表示 1%程度上显著,**表示 5%程度上显著,*表示 10%程度上显著。

四、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农民工参加同乡会的情况及其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参加同乡会对其劳动收入会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控制了农民工同乡会参与的内生偏差,这种显著影响依然存在。

根源于乡情的同乡会是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的限制被逐步打破,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社会资本的形式和层次也在发生变化。农民既需要同在流入地工作生活的人建立关系网络,同时又要与原生社会网络保持联系,这两个网络往往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农民工特有的同乡关系网络,同乡会正是当这种同乡关

系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组织化之后的产物,其对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和互助,同乡会能够比较容易地吸纳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工,一方面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信息,另一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农民工的分散性而导致的个体利益受损,从而促进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提高。同乡会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流入地城市政府或社会组织难以具备的。因此,对流入地政府针对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来说,应正视农民工同乡会的经济促进功能,积极联系当地农民工同乡组织,加强交流沟通,提供适当支持,引导同乡组织朝着正规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从实证的角度印证了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同乡会存在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10] 张珣、杨善华:《“共识”、“无害”、“主流”下的存在合理性——从同乡会的架构和发展看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智慧》,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1)。
- [2] 王静:《试论近代天津的山东旅津同乡会》,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7)。
- [3] [11] 杨舸:《同乡会、商会与工会——农民工组织功能及其构建》,载《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城市化加速期社会建设论文集》,2011。
- [4] 李元香:《“民间工会”对传统工会的冲击和影响》,载《法制与社会》,2012(12)。
- [5] [7] [15] 张春泥、谢宇:《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载《社会》,2013,33(1)。
- [6] 杨宜音、张曙光:《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对大学生“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载《社会》,2012,32(6)。
- [8]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9] 杨福忠:《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与保护程度——以农民工入会为视角的宪法学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4)。
- [12]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4)。

- [13] 卞智勇:《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工资决定的影响》,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14] 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基于有序响应模型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载《管理世界》,2013(9)。
- [16] 宗成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决定的调查分析——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3)。
- [17] 何国俊、徐冲、祝成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载《农业技术经济》,2008(1)。
- [18] 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载《社会学研究》,2007(6)。
- [19] 黄利、周密:《农民工与市民的工资决定及差异——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载《中国管理科学》,2011,19(12)。
- [20] 章元、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载《管理世界》,2009(3)。
- [21] 郭申阳、马克·W·弗雷泽:《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The Influence of Townsmen Association on Rural Migrants' Labor Income

SONG Yue-ping, MA Te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s a form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townsmen association is resulted from mig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townsmen associations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employment. Meanwhile scant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impacts of townsmen associations on the labor income of migrants. Using 2013 National Migrants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the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situation of townsmen association among migrant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ownsmen association on the labor income of migrants. In order to control endogeneity bia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applied. The study finds that migrants participating townsmen association would have higher labor income. It suggests that townsmen association as a sort of social capital woul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s.

Key words: townsmen association; labor income; social capita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责任编辑 武京闽)